

外国文学史丛书

にほん詩史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日本诗史

罗兴典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丛书

に ほ



日本诗史

罗兴典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诗史 / 罗兴典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外国文学史丛书)

ISBN 7-81080-482-0

I. 日… II. 罗… III. 新诗—诗歌史—日本

IV. 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992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赵丽君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8 字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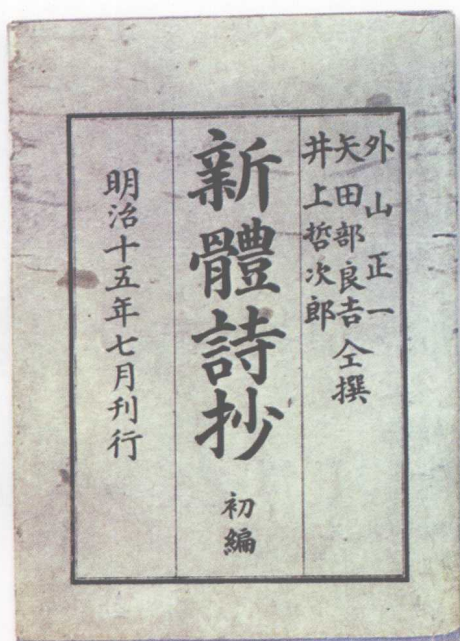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1080-482-0 / H · 178

定 价: 28.4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罗兴典教授为研究生讲授“日本诗史”时的合影







要 旨

《日本诗史》写的是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诞生的日本新诗(现代自由诗)史。关于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诗歌,在本书的“序章”中,收入了“日本最早的诗与歌”和“日本新诗诞生的途径”两篇文章作了精辟的论述。

日本新诗,源于1882年问世的《新体诗抄》。在它1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朝代,产生过许多流派,出现过众多代表诗人,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汇成了多彩的诗史长河。本书叙述的内容正是这一多彩的新诗发展过程。

《日本诗史》由图片、序文、序章、正文(十三章)、日本诗坛历年大事记等附件构成,全书约30万字。在编写上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史实性。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大量参照日本原文权威史实资料,经过比较、选择,尽可能再现《日本诗史》原貌,力求事事有史可证。

二、综合性。以中国方面观点及作者见解,纵览历史,横观流派,细察每位代表诗人、诗作,分析各个朝代的诗坛概况和诗史特征,综合发现贯穿整个诗史的主线,并加以重点描述。这根主线就是借助外国诗派动力形成的日本新诗流派——各朝各代多姿多彩的新诗流派。

三、可读性。行文简明、生动,力避艰涩。除了大量叙述史实

外,还大量叙述了各流派代表诗人及其诗作,使读者既能认识日本诗史的面目,又能领略日本新诗流派的风采,还可以品味日本新诗的风韵。并把作者置于一个读者的地位,倾诉自己对每个流派、每个诗人、每首诗作的内心感受,品评每位诗人诗作的风格和特色。

权威人士评价:“《日本诗史》不仅是一部日本现代诗的历史,也是一部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日本文化思想史。”“这是一部关于日本新诗的‘袖珍百科事典’。”

序

刘德有

70年代末,我结束了在日本的记者生涯,回到北京。不久,我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注意到“罗兴典”这个名字。我发现,他经常译介日本新诗,而且译得很精彩,评介文字也颇见功力。后来,我在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又数次收到他寄赠的译诗集,但我们相识却仅是年内的事。

诗,我仅仅是一个爱好者而已。由于我小时候学了一点日文,后来一直从事对日工作,所以对日本的新诗有些兴趣。50年代初,我从大连调到北京工作,闲暇无事,也常去旧书店逛逛。在当时买到的书中,就有战前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岛崎藤村自选的《藤村诗抄》以及北原白秋的《白秋诗抄》和《白秋抒情诗抄》。年轻时,我也曾试着翻译过壶井繁治的诗《五月之歌》、《直到这一天的到来——写在“松川事件”全体被告被判无罪之日》以及《球根——寄1964年》等。但我于此道却没有深入下去,便半途而废。2000年5月,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时,我这个半“诗盲”竟被推选当了会长。罗兴典先生被聘请为顾问。翌年5月,在北大举办了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从大连专程赶来的罗兴典先生。他告诉我,他最近完成了一部《日本诗史》稿,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希望我能为此写一篇序言。我明知自己不胜任,却盛情难却,只得“恭敬不如从命”。

收到罗兴典先生的书稿,自然是先睹为快。《日本诗史》,写

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新诗产生的原因、发展、变迁和现状,以及在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同时还深刻地分析了日本新诗与西欧各国诗歌的关系。其跨度为日本的四个朝代,即明治、大正、昭和、平成;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日本新诗的发展轨迹。《日本诗史》不仅是一部日本现代诗的历史,也是一部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日本文化思想史。罗兴典先生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据说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日和心血,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这样可喜的成果,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它的上梓问世,对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和日本文学研究界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纵览《日本诗史》,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曰系统性

日本的新诗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其发展又经历了几个阶段。概括地说,日本的新诗是明治初期从模仿西方的诗开始的。井上哲次郎等人译著的《新体诗抄》(明治15年出版)起到了提倡新诗的作用,从此日本迎来了新诗的黎明。明治22年问世的《於母影(面影)》,是森鸥外等人的译诗集。它的新鲜语言和诗感,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新的诗型能够表达清新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到了明治中期,岛崎藤村出版了《嫩菜集》,起了日本近代抒情诗的先驱作用,日本诗坛逐步进入了浪漫主义阶段。明治38年出版的上田敏的译诗集《海潮音》和大正2年出版的永井荷风的译诗集《珊瑚集》把法国象征派的诗译介到日本。在其影响下,日本诗坛出现了蒲原有明、三木露风等著名象征派诗人。另一方面,在自然主义思潮影响下,日本产生了用口语写自由诗的运动。而在这一时期,以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所代表的唯美享乐主义也风靡了日本诗坛。进入大正时期,受到“白桦派”的人道主义影响,理想主义的诗盛行起来。同时,民众诗派也迈出了坚强的步伐。特别是这一时期,萩原朔太郎以他的《吠月》、《青猫》、《冰岛》等诗集,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近代诗完成者的地位,而且成为昭和现代诗的起点。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

期,日本译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大量新诗。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日本诗坛出现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新倾向。与此同时,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日本出现了无产阶级新诗运动。而另一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和抒情派的诗人也很活跃。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时期,日本诗坛出现了所谓“顺应国策”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二战结束以后,日本诗坛走向复兴,在战争的废墟上,诞生了“荒原派”等各种流派,诗人们追求人性的恢复和诗的本质。直至今日,日本诗坛的许多具有个性的诗人继续开展着多彩的活动。

在我国,全国解放以前,日本的新诗就曾被翻译介绍过来,但应该说凤毛麟角,为数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又陆续地翻译了不少,但多是一些进步诗人的诗。改革开放后,一改过去的状况,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的日本新诗不仅数量有明显的增加,而且范围也更加广泛了。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日本新诗还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至于把日本新诗上下一百多年贯穿起来的诗史,则极为罕见。像罗兴典先生的《日本诗史》这样一部脉络清晰的日本新诗的历史,把日本近现代各个时期、各种流派新诗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流派的代表诗人和代表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恐怕还是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诗史》填补了中国对日本新诗研究和中国出版界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二曰综合性

《日本诗史》涉及的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共达 320 多人;列举的诗集,包括诗刊和诗文集达 520 多种,新诗 200 多首。作者在书中结合历史背景和诗人个人的出身经历,细察了每一位代表诗人,并对他们的流派和诗作,做了深刻的分析。读了全书,我感到这是一部关于日本新诗的“袖珍百科事典”。我边看书稿,边想起了许多往事:

记得 1954 年夏,日本有一批国会议员在参加斯德哥尔摩和平会议以后,前来北京访问。代表团成员、后来出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先生在廖承志同志举办的宴会上,作为余兴,唱了土井晚翠

写的《荒城之月》(泷廉太郎配曲),其第一节的译意是:

危楼设酒赏樱花,
传杯劝盏月影斜,
千载松枝难遮掩,
昔日清辉照谁家?

(罗兴典译)

那富有日本民族的情调和深沉的浪漫主义感伤,以及“月下荒城”的怀古气氛,很有感染力。不仅如此,歌词用语的刚健,格调的高昂,音律的明快,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罗兴典先生在本书中把同属于日本浪漫主义诗人的岛崎藤村和土井晚翠作了比较,指出藤村的诗有着女性的温柔,使用的是优雅的日本语言,而晚翠的诗则具有男性的雄健,更长于使用刚健的汉语词汇。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书中提到的石川啄木(1886—1912),也是我喜爱的诗人。1998年春,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对日本进行考察和研究,住在东京神乐坂。没想到这条街道竟与石川啄木也有关系。神乐坂有一家铺面不大的文具店——“相马屋”,出售明治时代的文人喜爱用的稿纸。一天,我到那里去买稿纸,发现玻璃柜台里放着一本翻开的《石川啄木全集》第六卷日记部分。这位早熟的天才诗人,贫病交加,仅26岁就英年早逝。他在1912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写了他到“相马屋”去买稿纸的情况:“今天午后,节子(注:石川啄木之妻)带孩子到本乡去购物,把我那件翻新的衣服也从当铺里赎了回来。好久没有给孩子买东西了,便买了玩具、兜子等,孩子很高兴。”

“吃罢晚饭,我以非常冒险的心情,坐上人力车到神乐坂的相马屋购买稿纸。归途,到一家书店花二圆五十钱买了一本克劳泡特金的《俄罗斯文学》。冷,真够冷的,但不觉得怎样。”

“书、纸、笔记本、车费,总共花了四圆五十钱。每天过着没有钱的日子。偶尔有了钱,也舍不得花!但又要违心地花!这种心

情,使我感到悲哀。”

罗兴典先生在书中评价石川啄木说:“似乎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诗人中,尚未发现哪一个诗人的心能与石川啄木的心——一颗苦追光明的诗心——相比。他虽然不是无产阶级诗人,但他留下的著名诗论和真切感人的诗作,足可以使一切诗人感奋!它像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布满迷雾的日本诗坛,至今仍不失它的灿烂光华。”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在此我还想到另一位诗人——活跃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诗、童谣和新民谣方面创造了辉煌业绩的野口雨晴。1961年春,我随作家刘白羽、诗人林林访问东京,一天,到井之头公园赏樱。陪同前往的中岛健藏先生夫妇特意给我们介绍了立在园内的野口雨晴诗碑。从此,我便注意了这位日本人民喜爱的自称“乡土气息浓厚的自然诗”的诗人。70年代我在日本做记者时,NHK电视台曾播放过介绍野口雨晴生平连续剧《青出于蓝》,每天早晨15分钟,我非常有兴趣地坚持看了下去。不想,1996年冬我有机会访问了诗人的出生地,并参观了设在北茨城市矶原町的“野口雨晴纪念馆”。场内不时地传出为这位诗人的作品谱曲的歌谣“蓝眼睛的人偶”、“十五晚上的月姑”、“七子”、“金船”等。我读了本书关于野口雨晴的介绍,怎能不感到格外亲切?

总之,本书在读者面前所展现的是一条由日本近现代众多代表诗人和许多流派汇成的川流不息、异彩纷呈的诗史长河。

三曰开拓性

本书作者为了力求事事有史可证,查阅了大量的日本原文权威史实资料,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他始终立足于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坚持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搞人云亦云。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新诗的诞生,亦即新的诗概念和原理的出现以及新诗的表述(含语言)、方法等“新因素”的形成,往往脱胎于旧诗传统内部。日本也不例外。为此,罗兴典先生在本书的“序章”中收录了他本人撰写的《日本最早的“诗”与“歌”》和千叶宣一先生的

宏论《日本新诗诞生的途径》，借以阐明日本新诗的产生与其本国的传统的血肉关系以及与对外文化交流（包括古代同中国的和近现代同西方的）的关系。作者在“结束语”中指出：“回顾日本新诗的进程，瞩目各个诗歌流派的风采，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诗歌，在它发展历程中会像日本诗歌那样沾有那么多异国情味。它的每一流派的诞生，几乎无一不是脱胎于外国诗派（特别是欧美诗派）。当然，日本诗人们虽然热衷于外国诗派，但并不是鹦鹉学舌般地模仿。他们的诗歌是模仿西风创造出的岛国诗歌，于异香异彩中饱含着独特的扶桑诗韵，并在这种诗韵中诞生了日本独特的诗史。”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本书在谈到日本新诗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只谈它们本身，而是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内在和外在的诸条件和基础，与时代挂钩，写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等背景。例如，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明治维新打破了长期闭关锁国，随之而倡导“文明开化”，使先进的欧美文化涌入日本列岛，唤醒了人们的近代意识。在西方启蒙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诗人们不再满足于“和歌”、“汉诗”、“俳句”等固有的传统诗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以实现他们渴望的自由平等和近代人的自我意识。在这种形势下，显示日本新诗即将诞生的《新体诗抄》，便应运而生。又例如，书中指出，大正时期日本诗坛兴起民众诗派，出现了诗歌大众化和白话自由诗的时代，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然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民主浪潮在日本涌起，以及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本书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欧洲兴起的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日本诗坛出现了未来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诗歌，企图全面否定传统的诗美和语言秩序的“新兴诗运动”，以及在大正末期出现的一批有着鲜明阶级立场的工农诗人，为日后兴起的无产阶级诗潮起到了先头作用这些重大变化等等，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不言而喻，这种分析使本书增加了厚度和深度。

再次，本书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

争,直到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这一期间的日本诗坛动态,做了如实的客观的描述。罗兴典先生认为,日本在对外推行侵略扩张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日本近代最黑暗、最疯狂的时代。”日本诗坛受当局的控制与监视,诗人们被组织到“尽忠报国”的“新体制运动”中来,有的被征派往战地,鼓吹“圣战”,有的大写特写所谓“爱国诗”,公然支持侵略战争,极尽赞美天皇、皇军之能事,真可谓丑态百出。当时只有极少数诗人保持缄默。而在那个年代,凡是不参与“新体制运动”的团体,不歌颂“圣战”的期刊,统统遭到取缔,有关的人员则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牢中。罗兴典先生不仅较全面地介绍了“战争期间”日本诗坛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投降后日本诗坛出现的怪现象:“战后,(那些在战时大写特写‘爱国诗’并被称为‘国民诗人’的)诗人们谁也不愿意暴露在战争中的真实嘴脸,也极少有人敢把他的战争诗收入诗集之中。要是有人追究起来,他们各自戴着‘面纱’,或闭口不谈自己曾写过‘爱国诗’,或抛开自己专门指责写‘爱国诗’的人。有的诗人承认自己写过但不涉及具体诗作;有的诗人则把责任推给时代,结果,诗人们在战争中的丑态,便原原本本地掩盖下来,所谓效力战争问题、战争责任问题也被束之高阁,进而转化为战后责任问题,共同踏上了战后诗的新起点。”在中国,谈论战时日本诗坛的情况时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认为,日本诗坛的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它与日本在战后没有彻底总结和清算过去的侵略历史这一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这个问题至今在日本未得到彻底解决。那种企图重温旧梦的温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铲除。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编纂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首相和一些政要有恃无恐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都绝不是偶然的。

说到开拓性,我还想说本书在介绍日本诗坛的现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给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情况。如果作者不是亲自到日本做实地调查和采访,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